

第一章 汉代以前的对外贸易

“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①即对外贸易是从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疆域辽阔，与众多国家及民族接壤，又有着绵长的海岸线。因此，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代以前，通过陆、海两路，中国古代先民们已同境外国家、民族开展了贸易往来。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东西方交通

大量的文献及考古材料证实，至迟在夏商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已和外界发生了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古代多部典籍记载了中原与新疆、中国与中亚之间部族首领相互往来的事迹。《庄子·天地篇》记载“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贾谊《新书》也说到“黄帝涉流沙，登于昆仑”，尧“身涉流沙地”会见西王母；《荀子·大略》中记载：禹曾“学于西王国”。此外《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同书还说到，帝尧时，“渠搜氏来宾”。据考证，上述文献中的昆仑山、流沙地、西王国均在今中国新疆境内，渠搜为中亚古国（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描述了3000年前西周第五代君主周穆王西游的故事，书中记载了周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

王姬满率六师之众，于公元前 989 年驾八骏马车带着大量丝绸等物，从镐京出发，向西北进入犬戎地区（今陕西西部）。然后溯黄河而上，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登上昆仑山。史称周穆王在昆仑山采购了大量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然后继续西行，到达西王母之邦（其位置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新疆北部，另说在今中亚锡尔河中上游地区）。周穆王送给西王母许多精美的丝绸，受到西王母隆重的接待，以致穆王“乐而忘返”。此后穆王又由此向北行进 2000 里到达中亚草原，最后经伊犁河谷天山北路回返中原。周穆王西巡，每到一处都向当地部落酋长馈赠丝绸、铜器、贝币等，各地酋长也回赠了大量马、牛、羊及各种土特产。据考证，周穆王西行的大致路线为：自陕西出发，入河南，经山西至内蒙，溯黄河过宁夏至甘肃，经青海越过昆仑山进入新疆，翻越帕米尔高原，最后到达中亚伊朗高原。《穆天子传》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根据穆王西征犬戎的故事及西王母的神话传说编写的，故书中内容不足信，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及中亚地区交通及贸易的情况。

近代以来，中国及境外的考古发掘资料为远古时代的中外交往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76 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商代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经科学鉴定，基本上都来自新疆。而在新疆地区也发现有来自我国东南沿海或印度洋沿岸的海贝。另据考证，殷商文化与远在西伯利亚以及欧洲的青铜文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在叶尼塞河和额毕河上游的卡拉苏克文化（前 13 世纪—前 8 世纪）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三十多件具有商代风格的陶鼎和陶鬲及为数众多的青铜器，如青铜小刀和两头弯曲中间平直的弓形器都极似安阳发掘物。此外，该地出土的青铜矛和铜簇亦与安阳商代同类物相似，所不同者，只是前者的铜矛只一侧有环，而安阳的铜矛是两侧都有环。

当沉重的青铜器被辗转西运的同时，中国精美的丝绸也跨越万水千山源源流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

第二节 早期的丝绸外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但究竟始于何时，古代文献记载不一。或说始于伏羲氏；或说始于神农氏；也有传说发明养蚕织丝的人是黄帝的妃子嫫祖（西陵氏的女儿），以致嫫祖被后世尊称为蚕神。不过，这些说法多近似神话传说，不足为信，养蚕织丝技术应是生产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创造出来的。但我国蚕丝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可以断言的，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丝织品的残片及丝线等，经鉴定这批丝织物距今已4700年。可以肯定，在殷商以前我国已开始了蚕丝生产。到商代，丝织技术继续发展，甲骨文中已有蚕、丝等文字，出土文物中已见到精美的刺绣品及暗花绸，表明这一时期丝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到西周时期，丝织业已遍布山东的兖州、青州，江苏的徐州、扬州，湖北的荆州，河南的豫州等地，并且出现了官营和私营两种生产组织方式。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丝织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丝织品的种类日益丰富，当时已出现了罗、纨、绮、绋、锦、绣等，丝绸产量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丝绸贸易普遍展开，《诗经·氓》中即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战国大商人白圭做生意而获取巨利的秘诀是“岁熟取谷，予以漆丝，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即丰年时收购粮食、抛出漆和丝，荒年售出粮食买进丝和漆。

随着丝织生产的发展，丝织品的贸易不限于中原，而逐渐流向远方。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拉沟东口，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丝织物。而在此之前的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地区发现了一批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石顶墓葬，“由于墓土封冻很结实，墓中很好地保存了中国的丝织品和其它物品”，其中在乌拉干河流域巴泽雷克地区

发现的 5 号墓中“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连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素底间”。^① 在西亚的伊朗，据波斯《贝希斯敦铭文》记载：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中国丝已见于波斯市场。在南亚的印度，成书于公元前 4 世纪的《考铁利亚》一书中也记载，“支那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另一部印度古籍《摩奴法典》中有关于偷窃丝的惩戒，“谁偷丝，谁就被罚三天内只许喝牛奶”；“谁偷丝，就变成一只鹪鹩鸟”。^② 在欧洲，德国考古学家曾经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 500 年的古墓，其中发现有中国丝绸服装的残片。而古希腊的一些雕刻和陶瓷彩绘人像所穿的衣服，被肯定为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丝绸，如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埃里契西翁的加里狄狄像等都穿着用中国丝绸制成的透明长袍。

由此可见，中国丝绸最迟在春秋战国时已远销到西方，成为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产品，因而他们把中国称为“赛里斯国”，意即丝之国。

综上所述，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以贩运丝绸为主的国际交通贸易道路——丝绸之路就已经出现了。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形成

公元前 6—4 世纪，西亚的古波斯帝国国力强大，全盛时其疆域西达地中海东岸，东至印度河流域，北起锡尔河，南抵阿姆河，境内驿道遍布，交通发达，从而使中亚、西亚和南亚联系起来，进而沟通亚欧两大洲。而公元前 4 世纪，马其顿皇帝亚历山

① 参见《考古》1957年第2期《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

② 《摩奴法典》系印度奴隶制时代有关宗教、法律、哲学的汇编，传说该书是由人类始祖摩奴所编。

大东征对从地中海至帕米尔交通道路的形成再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率大军从马其顿出发，向东占据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又南下占领了埃及，进而再东克两河流域，灭掉古波斯帝国，最后直抵印度河流域。经十几年战争，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不久，亚历山大死去，帝国分裂为几个独立王国，其中以今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国（又称叙利亚王国），疆域辽阔，全盛时占有自地中海东岸——印度河以西的广大地区。西方人以军事征服为目的的东进，客观上促进了帕米尔以西至地中海交通贸易道路的形成。

在帕米尔以东中国境内，春秋时期，日益强大的秦国不断向外征伐。在秦西北即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一带分布着诸多西戎小国，先后被秦征服。到战国时期，西戎诸国均被秦吞并，自中原至河西的交通畅通。在西戎以西，汉代以前，中国一些古老的民族，如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等，都曾游牧于河西走廊一带，以后陆续迁徙到新疆及帕米尔以西地区。

塞人即先秦时的“允戎”，最初分布在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春秋时受到月氏人的驱赶，以后越过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向中亚迁徙，塞人在西迁的同时，也将中国丝绸向西方贩运，前述中亚巴泽雷克墓葬的主人，据推证即塞人贵族。另据西方文献记载，公元前 8 世纪，一部分塞人西迁到黑海西北，公元前 6 世纪他们和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

月氏原来居于敦煌——祁连间，春秋时期势力强盛，向西驱赶塞人，到汉代初年，月氏被日益强大的匈奴人击败，被迫西迁，进入伊犁河流域，赶走塞人，占领了原塞人之地。大体在匈奴老上单于（前 174—前 161 年）后期，月氏又受到匈奴支持的乌孙人的排挤，大部分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一带。这部分人被称为大月氏，小部分未迁的月氏人进入祁连山与羌人杂居，史书将其称为小月氏。

乌孙原本亦居于河西敦煌一带，常受月氏欺侮，后在匈奴的

支持下，进入伊犁河流域赶走月氏，占领其地，建立了以阾池（今伊塞克湖）为中心的乌孙国。

塞人、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在漫长的时期内，不断地、大规模地自河西向新疆再到中亚的迁徙，直接促进了河西至新疆、中国至中亚交通道路的形成。

综上所述，汉代以前，东西方交通路线已经形成，丝绸贸易也在辗转进行。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中外贸易没有政府的参预，缺乏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中外交通路线的畅通和安全得不到保障，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表现出民间性、不经常性、边境辗转性的色彩。

第二章 汉代的对外贸易

公元前 206 年，汉高祖刘邦创建了汉帝国。经过多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国弱民贫。汉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高祖、惠帝到“文景之治”，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并日益走向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空前提高，其中丝织、漆器、冶铁制造业更是有了长足进步。

深受中外人民喜爱的丝绸的生产，汉代时已高度发达，丝织工场规模庞大，如临淄的官营作坊“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钱巨万”。^①京师长安的东西织室，所需费用更高达数千万之多。民间也是“环庐树桑”、“女修蚕织”，因而丝织品产量大为丰富。前代“庶人耄老而后衣丝”的礼制被彻底打破，出现了“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一些富人家甚至使“犬马衣文绣”。^②丝织工具进一步改进，技术更加高超。比如，河北钜鹿人陈宝光之妻发明了 120 综和 120 镊的提花织机，能织造各种各样的花纹。出土文物为这一时期的丝织业的发展水平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佐证。1972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发掘出土了大量汉代的丝织品，其种类繁多，有平纹的绢、纱，提花的素色绮和罗，以及彩色的提花织锦。这些丝织品织造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如其中的纱，薄如蝉翼，丝的拈度，每米达 2,500 - 3,000 回，已接近今天电机拈丝每米 3,500 回的水平。而锦是所有丝织品中最高级的，特别是其中的起毛锦（又称起绒锦、绒圈锦），色彩图案最为精美，

① 《汉书·贡禹传》。

② 《盐铁论·散不足》。

工艺也极其复杂。据研究，这种锦“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花型层次分明，绒圈大小交替，纹样具立体效果，因而外观甚为华丽。”^①此外，丝织品的染色及印花技术也十分惊人。出土的丝织品色泽亮丽，颜色繁多，大体上有二十余种，且各种颜色都浸染得很深透，色调配合均匀。

兴起于春秋末年的漆器制造业，在汉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漆器制作工艺更加精细，种类更加多样，成为汉代人喜用的日用品，而其中的高级品则成为上层社会的装饰品或珍玩。前述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还同时出土了 148 件漆器，专家报告称：“这些漆器纹饰细致、流畅。花纹除平涂外，大量使用线条勾勒，……这批漆器色彩使用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②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了冶铁业。到汉代，铁器制造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冶铁高炉体积增大，还出现了水力鼓风机。另外，在炼铁中开始使用石灰石作熔剂，使铁的质量大大提高。近代仍在应用的球墨铸铁法已经出现，并且已发明了由铸铁脱炭的百炼钢。

手工业的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大一统的汉帝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为稳定边疆、维护国家统一，需要加强与周边各国、各民族的联系。因此，两汉时代，中国封建政府致力于开拓陆海对外交通，因而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出现了空前的畅通，中国对外贸易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

第一节 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一、张骞通西域

关于西域的地理概念，各种文献表述不一，大体上在汉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直至欧洲的广大地区；狭义主要是指西域三十六国，即今新疆南疆地区。到清代，则将南疆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天山以北地区合称“西域”。

汉初，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日益强大，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向东击败东胡，向西驱逐了大月氏，并不断向南侵犯，汉朝北部边境受到严重威胁。汉高祖刘邦于汉七年（前 200 年）曾率大军进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今山西阳高县境内），史称“白登之围”。其时汉王朝立国不久，国力虚弱，无法支持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汉高祖只好采用谋士娄敬的计策，同匈奴“和亲”，将汉公主嫁于匈奴单于，并“厚奉遣之”，每年赠送匈奴大量丝绸、美酒、粮食等礼物，以此缓和与匈奴的关系。

文景时期，汉继续与匈奴和亲。匈奴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汉文帝时，匈奴征服了西域诸国，并在此实行残暴统治。“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西域地区完全被匈奴控制。匈奴对汉朝的态度也越发蛮横，不断侵犯汉边，抢掠人畜，毁坏农田，其游骑甚至曾迫近长安，对汉朝威胁日益严重。

与此同时，西汉政府休养生息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到武帝时，史载“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

朽不可校’^①，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汉对匈奴发动反击战争的物质条件成熟了。

汉武帝即位后，便开始谋划反击匈奴，其制定的策略是：一方面积极组织军队从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尽量争取和联合与匈奴矛盾尖锐的西域各国，从侧翼夹击匈奴，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

汉武帝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对匈奴最为痛恨，一直打算报复匈奴，但苦于自身势力弱小又没有联合者。于是，汉武帝决定招募使臣出使大月氏，联络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出使。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张骞率领一百余人离开长安向西域进发，在经过河西走廊时不幸被匈奴俘获。匈奴单于企图诱其投降，故为张骞娶妻成家，但张骞始终坚贞不屈，持节不失，在茫茫戈壁被扣留了十几年，后趁匈奴不备率众逃脱。张骞等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冒险西行，克服千难万险，终于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大宛王早就听说“汉之饶财，欲通不得”，对张骞一行欢迎备至。随后，大宛王又派人送张骞到达康居（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间），由此南下大月氏。公元前 129 年，张骞终于到达了大月氏国，此时大月氏已占有大夏（今阿姆河上游一带），这里土地肥沃，百姓安居乐业，不愿再东来与匈奴为敌。张骞在此停留一年多，几经努力，终无结果，只好返回。为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是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试图经羌人控制的地区返汉。不幸，张骞一行在羌中（今青海）又被匈奴游骑捕获。一年以后，张骞又乘匈奴内乱之机，与随员甘父（又名堂邑父）一起逃脱。公元前 126 年（武帝元朔三年），张骞终于回到长安。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 13 年，出发时队伍达百余人，

^①《史记·平准书》。

归来仅剩他和甘父两人。张骞此次出使虽未达到与大月氏结盟的目的，但却传播了汉朝的声威，了解到大量关于西域的地理、物产、军事等情况，为汉朝军队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此后，张骞多次充当汉军的向导，因其“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汉朝军队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张骞也因此被封为“博望侯”。到公元前 121 年（武帝元狩二年），汉军占领河西，从此“自盐泽（罗布泊）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此外，张骞在大夏时，曾看到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蜀布，由此获悉，自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经缅甸至印度进而到中亚有路可通。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派出使团试图打通这一后世所谓的“西南丝路”，结果被云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所阻。到公元前 111 年，武帝再次发兵云南，仍未能成功。汉政府虽未能控制西南丝路，但这一道路在沟通中国与缅甸及印度的民间贸易上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决定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是与西域大国乌孙结盟，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联络西域其他国家，彻底击败匈奴。此次张骞及其副使率领将士 300 人，每人备马两匹，携带牛羊万头及金币、丝帛数千巨万，张骞一行顺利抵达乌孙，受到乌孙王热情欢迎，但乌孙王不愿接受汉王朝请其回河西故地的建议。张骞在此停留期间派其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阗（今中国新疆和田）、扞弥（今中国新疆于田）及周边诸国。张骞于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与乌孙使者数十人返回长安。乌孙使臣亲眼目睹了汉王朝的富强，乌孙王接到报告后，随即与汉朝结盟，共抗匈奴。与此同时，被张骞派往各国的副使也同各有关国家的使节一起陆续回到长安。自此，汉朝与西域及西方诸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张骞亦因其出使有功，被封为“大行”（负责外交礼仪的官员）。次年，张骞病逝于长安。

张骞两度出使西域，达到了孤立匈奴的目的，为汉朝军队取

得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随着匈奴势力的削弱，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大大促进了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首先，在政治上，丝绸之路畅通后，我国新疆与内地首次连为一体，关系日益密切。到公元前 60 年（宣帝神爵二年），汉在西域设立都护，从此确立了新疆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其次，随着张骞及其副使出访中亚、南亚、西亚各国，各有关国家也派出使臣回访长安，由此建立起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常性的外交往来。再次，在中西方外交关系建立的同时，丝路贸易日趋繁荣兴旺，且以使臣相互往来为主要形式的官方贸易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史书记载：汉王朝每年派出使臣十多批，每批使团人数从数百人到百余人不等，出使一次时间长达数年或十数年，往返的使团经常在丝绸之路上相互遇到。汉朝出使者“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而外国来华使者同样也是“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可见，外交使团相当于官方商队，他们是以官方交往为名，行贸易之实。由此，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等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天山南北及中亚、南亚及西亚各地。境外的奇禽异兽、象牙珠宝等奢侈品也大量涌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政府维护下，丝路贸易日益呈现出官方的、经常性的、远达西方各国的色彩。中外经济贸易往来空前活跃。与此同时，文化思想也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着广泛的交流。

总之，张骞出使西域及随后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不但解除了汉王朝的边患，为汉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而且直接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从而揭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新纪元，使中外经济、文化得以广泛交流。由此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司马迁盛赞张骞通西域有“凿空”之功。

二、丝绸之路的路线

丝绸之路是东自中国西汉的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向西

经河西走廊、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迄于地中海东岸的一条横贯亚洲大陆的商路。由于自然的分割及沿线各个国家间、民族间的纷争，这一道路并非是单一而笔直的，而是一个东西相连、南北交错的网络。处于网络中的多条道路经常变动，但就其主干线而言，由于联结着一些政治、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的城镇，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大体上干线全长约七千多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约四千多公里。

这里将丝绸之路干线在中国境内外分布状况分述如下。

（一）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汉都长安，这里是外商来华的终点，也是中国商人西行的起点。从长安向西至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东段。这段商路分为南北两道，北道是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礼泉、乾县、彬县、长武、泾川至平凉，再经固原、海原、靖远、景泰、古浪至武威。北道的开通，是在西汉时期。南道是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武功、郿县、宝鸡、千阳、陇县、陇城、秦安、通渭、陇西、渭源、临洮、临夏，至青海的民和、乐都、西宁，再往北过大通河（古浩门河），越祁连山过扁都口，经民乐至张掖，在此与北道汇合。南线的开辟，也始于西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走的这段路程。其后，东晋的法显从长安经河西、新疆到印度去求法取经，也正是途经此道。由于南道位于黄河以南的农耕地区，因此，自然条件优越于北道。以上是南北两条干线，此外还有若干条支线，这里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中段即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由于其夹在祁连山与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一千多公里，宽约数公里到一百多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而得名。这里是由中原抵达西域的最理想的通道，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中间经过的丝绸

之路重镇有：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盐池、临水、酒泉、嘉峪关、玉门镇、布隆吉、安西及敦煌。

汉代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又分为南北两道，此即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西段。《汉书·西域传》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音彼，意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后汉书·西域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自鄯善逾葱岭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可见，丝绸之路在新疆有两道，南道是指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东西通道。这条道路由敦煌（今敦煌西）出阳关（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过鄯善（本名楼兰，都城为扞泥，今若羌县治卡克里克），沿昆仑山北西行，经且末（今且末县，塔里木盆地东南）、精绝（今民丰县北）、于阗（今和田一带）、皮山（今皮山县）至莎车（今莎车）；北道是沿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西行，由敦煌出玉门关（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城），越流沙，至车师前国（今吐鲁番），沿天山南西行，经焉耆（都城为员渠城，今焉耆西南四十里）、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丝绸之路在新疆之所以分南北两道，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在新疆境内中心地带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沙漠南北分别是终年积雪的昆仑山和天山，人类只能生存在由高山雪水浇灌的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带，因而商人、使臣亦只能沿着天山南侧和昆仑山北侧行进。

（二）中国境外的丝绸之路

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出国境后，是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的东段，仍分南北两道。南道，一是从皮山西南行至乌秣（今

叶尔羌河上游)而达罽宾(今克什米尔),二是从莎车,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沿帕米尔河过休密(今阿富汗境内的瓦罕),经兰氏城(今阿富汗境内瓦齐拉巴德)至木鹿(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马里以东),该商路抵达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这是两汉时中亚境内的一段主要商路。北道,一是从姑墨越天山,过阾池(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绕葱岭以北而达康居的郅至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江布尔),二是从疏勒西行越山道而达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奄蔡(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两者相比,后者是一段主要的商路。奄蔡的西界是博斯普鲁斯王国。该王国是希腊殖民建立的,公元前1世纪中叶成为罗马的属国。其都城潘提卡丕昂(今乌克兰刻赤)是转运东方商品往罗马的中间站。公元前1、2世纪,在安息控制经行伊朗高原和波斯湾的贸易情况下,该商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再往西是横亘伊朗东西的一段商路,是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的中段。它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与卡维尔沙漠之间,路途笔直而便捷。自木鹿西行经番兜(《后汉书》称和犊,希腊人称之为“百门”之城,即海克桐皮罗斯,今达姆甘附近)、拉盖(今德黑兰附近)、阿蛮(安息的夏都艾克巴塔那,今哈马丹)、至太西丰(底格里斯河左岸的安息王冬都,又称斯宾国,今巴格达东南二十英里)和塞琉西亚(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希腊商业城市,又称斯罗国)。这两城隔河相望,可视为一个整体。波斯萨珊王朝定此为国都,我国史籍称之为苏利城、宿利城或苏刺萨党那等,阿拉伯人称之为“麦大因”。

丝绸之路经过安息,再往西,是以塞琉西亚为起点往西北行由多条支路所构成的一段商路,称为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的西段。其路线主要有如下三条:一是以塞琉西亚为起点,沿幼发拉底河左岸,或经幼发拉底河附近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沙漠地带西北行,渡巴里赫河(今贝利赫河)至内塞佛立昂(今叙利亚的腊卡),再西北行至阿帕美亚城,过幼河至对岸祖格马镇,转西南

行，抵达安都城（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安都城在希腊化时期是塞琉古王国的首都，在罗马帝国时期是罗马“东方”总督的治所，也就是中国史籍所记大秦国的国都。中国的丝织品到达安都城后，一方面转贩欧洲各国；另一方面从安都城北上转西，越过小亚细亚的陶卢斯山（今托罗斯山）西去，至小亚细亚都城埃弗塞斯（今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一带），这条路被称为西段的中道。公元前 3 世纪至 2 世纪期间，它随着塞琉古王国的兴盛而繁荣。二是自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亚出发，渡幼发拉底河西北行，至杜拉·欧罗普（今叙利亚的萨利希亚堡），再西行抵达帕勒米拉（今叙利亚的塔德木尔），又西北行抵安都城，或西南行至大马士革，再转向地中海东岸的西顿、提尔，贝鲁特等港口，这条路就是西段的南道，它随着叙利亚沙漠北部商业城市的兴起而形成，到公元 3 世纪才逐渐衰落。地中海东岸出产骨螺，这种动物分泌的液体可制成紫色染料。提尔港以染紫工业和制作丝织品服装著称，从中国辗转而来的丝织品，便是在这里进行拆散和染紫，再织成当地喜用的轻纱。其所以染成紫色，是因为罗马人把紫色看成是最高贵的颜色。三是西段的北道，从太西丰出发，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北上，经古亚述都城尼涅微（今伊拉克的尼内韦赫），过河至摩苏尔（今伊拉克境内），西北行，经尼西比斯（今土耳其的努赛宾）、艾德萨（今土耳其的乌尔法）、阿帕美亚、祖格马镇至安都城。这条路因在北方，气候适宜，雨量充沛，水草丰足，商队往来不绝于途。

以上是经由中国境内和出中国国境经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除此以外，还有一条是经行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丝绸之路。两汉时期，天山以北就有路相通，但由于匈奴的侵扰受到了阻梗。《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始中（公元 1—5 年），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阨。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直到三国时，车师后部王内属魏国，这条路才得以

畅通，称之为北新道，相对两汉的北道而言。北新道一词，始见于《魏略·西戎传》。三国时的北新道，是在康居西北同汉代的北道连接起来，经奄蔡到达罗马帝国在里海沿岸的领土。这条路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显得十分重要。罗马帝国在公元 1 至 3 世纪，先后同伊朗的安息朝和萨珊朝争夺两河中上游地区。为了摆脱安息朝对丝绸贸易的控制，罗马力图开辟输入丝绸的新路。它一面利用印度洋上的季候风开展对东方的海路贸易，一面从黑海方面获得丝绸。北新道的开辟，满足了罗马帝国从陆路方面获取丝绸的需要。到了隋代，裴矩的《西域图记》也记述了这条路，称之为北道。到了公元 13、14 世纪，即元代时期，该路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三、汉代对丝绸之路的维护

丝绸之路畅通以后，西汉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保证其安全，促进丝路贸易的发展。到两汉之际，中原混乱，继起的东汉王朝在其统治初期，政权尚未稳固，无力顾及西域。匈奴乘虚而入，丝绸之路几度失控，出现了丝路的“三绝三通”。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一改西汉对西域及匈奴的传统优待政策。公元 9 年，王莽下令更换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和西域各地首领的印绶。西汉时，西域各地首领被封为“王”，王莽下令一律改为“侯”；把汉向匈奴单于授予的“玺”改为“印”，由此降低了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地位，引起他们对王莽的不满，于是相继起兵反莽。匈奴趁机而入，西域各地遂再次被匈奴控制。与此同时，河西、陇右各地军阀割据一方，丝路完全中断。

公元 25 年，东汉王朝建立，随即开始了打通丝路的事业。到公元 34 年，河西、陇右终于统一于东汉，自玉门关以东的丝路得以畅通。此后，西域一些国家逐渐与东汉政府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公元 48 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而北匈奴控制着西域大部分地区，其与汉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丝绸